

石船山

第四卷

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会刊

2005 . 5

衡阳师范学院

大学生王船山研究会

会刊第四卷

石船山

编委会:

顾问:周玉明 熊考核 许定国
朱迪光 雷庆翼 萧平汉
周念先 曾玲先 曾也鲁

名誉会长:许定国

技术指导:王利华 张云峰 黄育红

主任:何佳真

副主任:刘小敏 刘婵娟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梅梅 王亚平 尹丽君
达海军 刘玲靖 何皓杰
张 静 单玉红 武颖誉
郭 聪 倪卫君 贺文君





先哲故里 薪火相传

衡阳师院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成立已近四年，王船山先哲故乡的一群热血儿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弘扬民族先进文化传统的共同心愿驱使下，在博大泽厚的湖湘文化薰陶里，他们脚踏实地，励精开拓，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许多个“第一”：

这是船山故乡里第一个学习、宣传、弘扬王船山思想精华的大学生社团；这是衡阳师院第一个学术性研究社团；这还是第一个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走上国际性船山研究学术讲坛的大学生社团。

在由于种种原因相对沉寂的王船山故乡研究氛围里，这个社团的崛起，无论怎样评诂，历史都将给他们记下浓重的一笔。

他们有思想，有见识。形诸于文，见诸于行。出手不凡，卓而不群。社团创立伊始，就在省级核心期刊连续发表船山研究学术论文。

他们有毅力，有才干。内求团结，外塑形象。走出去，请进来。在省内高校学生社团中独树一帜，在师院社团评比中荣获“四星”称号。

他们有诚心，有真意。虚心向老前辈求教，好学上进，矢志不移，形成制度，坚持躬行。获得许多前辈学人长者首肯、赞许，莫不称之为“后继有人，事业有幸”。

他们有耐力，有自信。四年来，新老社团成员交替不断，信念坚定执着不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求真务实的社团精神，一届一届社团成员传承下来，已初步蔚然成风。

一种精神：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传统；一串脚印：四年历程历历在目；一排成果：学术刊物《石船山》，研究资料选编、论文目录、读书沙龙、学术讲座绵延不止——。

衡阳师院应该骄傲：她培育的这个社团能够与王船山先贤圣哲在精神学理层面接续承传；而王船山先生更应该自豪：在他生前挚爱的故乡热土上，中国共产党人高扬的“三个代表”旗帜猎猎飘舞，队列中，有他们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

值此《石船山》第四卷出版之际，谨为序。

许定国

2005年4月22日

序文

- 3 先哲故里 薪火相传 许定国

研究篇

- 6 论王船山“太和”哲学观的唯物辩证特质
——读王船山《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唐孝亮
- 13 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看王船山教育思想 何佳真
- 20 王夫之“情景”说对王国维“境界”(意境)说的传承性 刘小敏
- 26 王船山治国用人思想初探 李健魁
- 36 知识经济时代船山学传播初探 李镇东
- 44 哀感顽艳 纤尘不染
——《纳兰词》抒情主人公形象 王卓

散文篇

- 56 那些草花 唐毅
- 63 三月的记忆 邓佳佳
- 65 生命的盛宴 唐兆敏
- 69 榆树·木屋·坟 武颖誉
- 73 文人与海 罗俊杰

诗歌篇

- 58 沉默 唐建平
- 59 生命之约 刘国意
- 62 水调歌头 梅子
- 64 活在思念 达海军

随想篇

- | | |
|--------------|-----|
| 54 冲出困境 | 何佳真 |
| 61 衡阳印象 | 梅子 |
| 66 江边流淌的语言 | 万梅梅 |
| 68 世生无我 | 尹丽君 |
| 71 献给一次美丽的邂逅 | 何进成 |
| 72 济读随想 | 郭聪 |

评论篇

- | | |
|------------------|----|
| 74 背负着家园的诗人 | |
| ——从《失败之书》看北岛 | 石帅 |
| 76 关于文学的“歌德巴赫猜想” | 涂鸦 |
| 79 善良与正义的艰难维护 | |
| ——浅评《天下无贼》 | 汤俊 |

资料

- 81 王船山年表
- 85 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概况
- 86 学术动态与成果
- 87 大学生王船山研究学会大事记
- 89 本学会会员研究、创作、阅读参考书目
- 92 读者评刊表

论王船山“太和”哲学观的唯物辩证特质

——读王船山《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唐孝亮

【内容摘要】：“太和”是王船山哲学所构建的形上存有论世界，即“太和”世界。王船山认为，万事万物要达到“太和”境界，必将经历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即“聚散”、“动静”等的消长变化过程。本文试通过论述提出，王船山“太和”哲学观彰显出了唯物辩证的思维特质，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哲学里论极其吻合，从而为指导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马列主义做了哲学理论探讨和民族心理准备，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

【关键字】：王船山 太和 唯物辩证

王船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其哲学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前人哲学思想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清理，扬长避短、去粗存精，从而形成了一套结构异常严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代表着同时代哲学思想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王船山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述彰显出了一种唯物辩证的思想征象，强调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及各种矛盾运动。本文试通过对王船山《张子正蒙注·太和篇》的解读来窥探王船山哲学的唯物辩证特质，从而认为，王船山哲学中的思想光辉，代表着那一时代哲学思想发展的正确方向，其中的“太和”哲学观蕴涵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观点极其吻合，为中国人民走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哲学理论探讨和民族心理准备，对指导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作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贡献。

一、“阴阳和合”的“太和”观

“太和”是王船山哲学思想体系中一个极度重要的命题,它是构建王船山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太和”既是王船山所构建的形上存而论世界(张立文语),也是王船山对哲学境界的最高追求以及对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终极结果设定。同时,王船山也将“太和”理解为宇宙万物能和谐共处的内在规律和核心凝聚力。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对“太和”做出了理论界定,他指出:

太和,和之至也。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阴阳异撰,而其氤氲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可见,王船山认为,“太和”是一种至高的和谐状态,阴阳二气按太极之道相克相生于太虚之中,既相互融合而又不相悖害,从而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状态,这便是“太和”。顺着这种理解,王船山认识到,在还没有人类世界之前,整个渺茫的宇宙就已经按照一定的规律存在了,这种规律便是“太和”的规律。到了人类世界出现以后,这种“和”仍然存在,它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活秩序和生命规律,那么这种“和”是什么呢?船山谓之“太和”,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自然存在的一般规律,这与宗教里的上帝,神学中的神灵以及唯心主义所虚构的绝对理念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王船山的“太和”观中,强调了“人”的存在,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人物感交”。王船山曰:“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人生而物感交,气通于物,役气而遗神,神为使迷而迷其健顺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在强调“阴与阳和”的同时,船山指出了“气与神和”的不可忽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追求与自然的至交和谐也是人的追求,所以强调了人物感交是太和的精髓和灵魂,否则,“役气而遗神,神为使而迷其健顺之性,非其生之本然也。”

此外,王船山认为,“太和”是一种永恒的矛盾运动过程,万事万物有生动静,盛衰消长,但在这种运动变化过程中,“太和”的调节融合作用

是”永恒的,它推动旧事物的死亡,而同时又促成新事物的产生。如王船山曰:“人之生死、动静有间,而太和之氤氲本无间也。”王船山的这种思想贯穿在其对“太和”以及与“太和”相关的所有范畴的理解上,下文也将涉及到相关论述。

二、“健顺不妄”的“聚散”观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的事物是我们可以用肉眼目睹的,而有的事物则无法感受到,它是一种“无形”的存在。船山谓前者为“客形”,谓后者为“无形”,二者都是物质存在的形态,而不是有和无的区别。它们又都是一种存在,并非消灭,只是一种“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的区别。在船山看来,“客感客形”便是“聚”,即聚而为器物,“无感无形”便是“散”,即散而归二气。因此船山认为,事物聚则为有形,散则为无形,无论聚散,都是事物赖以存在的需要,事物有聚有散才能“健顺而不妄”。于此,船山对“聚”与“散”二范畴作了精辟的阐述。

王船山首先指出,无论怎样地聚散变化,事物本体是不会损失的。王船山曰:“于太虚之中具有未成乎形,气自是也,聚散变化,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事物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而在转化的过程中,即使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但事物并没有从此消失,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事物之间的“聚散”转化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这一观点在王船山太和哲学观中得到了恰好的体现。船山说:

散而归于太虚,复其氤氲之本体,非消灭也。聚而为庶物之生,自氤氲之常性,非幻成也。聚而不失其常,故有生之后,虽气禀物欲相室相梏,而克自修治,即可复健顺之性。散而仍得吾体,故有生之善恶治乱,至形亡之后,清浊犹依其类。

可见,王船山认为,承认事物之间的聚散变化是极其必要的,事物在聚散变化之中达到和谐、健顺。一种事物如能聚而有生,则它就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一旦事物相室相梏,无法存在,则可散而为他类。这样就可以保证宇宙自然的健顺之性。

认识了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王船山指出:

聚则见有,散则凝无,既聚而成形象,则才质性情各依其类。同者取之,异者攻之,故庶物繁兴,各成品汇,如其品汇之成各有条理,故露雷霜雪各以其时,动植飞潜各以其族,必无长夏霜雪、严冬露雷、人离草木互相淆杂之理。故善气恒于善,恶气恒于恶,治气恒于治,乱气恒于乱,屈伸往来顺其故而不要。不要者,气之清通,天之诚也。

王船山在此深深地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了事物的聚散变化,整个世界才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世间万物聚散交替变化、相得益彰,才能使得“庶物繁兴,各成品汇,聚散的”,那么,对于人生或生命的聚散变化,又该怎样去面对呢?王船山从更高层次对此做了思考:

气之聚散,物之生死,出而来,入而往,皆理势之自然,不能已止者也。不可据之以为常,不可挥之而使散,不可挽之而使留,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气之屈伸无所施其作为,命而已矣。

用“安生安死”的坦然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可谓是一种超凡豁达的生命境界观。不过,王船山最后将人之生死归于“命而已矣”,就显得有点宿命,体现了王船山在强大的自然聚散变化力量面前的退却,不能不说是王船山思想的局限所在。

三、“体静用动”的“动静”观

万事万物都是处在运动变化中,这是王船山所认可的,也是王船山不可动摇的最基础的认识论。在《周易内传》卷一《周易上经》中,王船山认为:“《周易》之书,乾坤并健以为首,《易》之体也;六十二卦错综乎三十四象而交列焉,《易》之用也。纯乾纯坤,未有易也,而相峙以并立,则《易》之道在,而立乎至足者为《易》之贤。屯、蒙以下,或错而幽明易其位,或综而往复易其几,互相易于六位之中,则天道之变化,人事之通塞尽焉。”

然而,相对而言,事物不可能总是处于变化不止的状态,事物总是有它固有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便是“静”其为事物,也就没有了具体器物

的存在。所以，“静”相对“动”而言是“动”的一种。动乃静之动，静乃动之静。关于动与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异常鲜明，如：

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根本性和根本存在形式，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这就意味着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和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运动的绝对性，不仅不排斥，反倒是内在地包含着其对立而静止于其中的。所谓静止，是指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处于暂时的稳定和平衡状态，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相对静止。（引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舒远招 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2001 年版）

.....

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关系是辩证的：绝对运动总是包含相对静止的一面，总是要以相对静止作为自己的尺度，因而不存在没有相对静止的纯粹运动；相对静止总是包含运动的一面，始终是绝对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因而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纯粹静止。（同上）

根据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运动与静止的理论，我们发现王船山的动静观与之如出一辙。王船山曰：“轻者浮，重者沉，亲上者升，亲下者降，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借阴阳和合之气所必有之几，而成乎情之固然，犹人之有性也。”在王船山看来，无论是动还是静，其实从本质上讲都是“动”。只不过静是动的一种存在状态罢了。当“动”趋向于行动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存在状态便是“动”，而当“动”趋向于止而不动时则表现出的存在状态便是“静”，看来，静是动的一种，静是相对于动而言的。

此外，王船山将动静与“阴阳”结合起来理解，从而更深层次地阐明了动与静的内在辩证关系，并强调了动静运动变化的最佳状态便是“太和”。王船山指出：“虚者，太虚之量；实者，气之充周也。升降飞扬而无间隙，则有动者以流行，则有静者以凝止。于是而静者以阴为性，虽阳之静亦阴也；动者以阳为性，虽阴之动亦阳也。阴阳分象而刚柔分形，刚者阳之质，而刚中非无阴；柔者阴之质，而柔中非无阳。”王船山认为，动显阳性，即使是处于静态也显阳性，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动静是蕴于阴阳之

中的,并不是分割在阴阳之中。在船山看来,“阴阳和合,谓之太和”,那么,相对应的,动静和合亦可谓之“太和”。于是,王船山进而论及:“误解《太极图》者,谓太极本未有阴阳,因动而始生阳,静而始生阴。不知动静所生之阴阳,为寒暑,润燥,男女之情质,乃固有之蕴,其氤氲充满在动静之先。动静者即此阴阳之动静,动则阴变于阳,静则阳凝于阴,……非动而后有阳,静而后有阴,本无二气。由动静而生,如老氏之说也。”可见,船山认为,阴阳二气是事物之本原,它是事先存在、永恒不变的,它存在氤氲之中不易觉察,而动静则使阴阳二气以不同的形式和状态显现出来,即使是阴处于动之中也可变为阳,例如,大气处静时并不可觉察,但如果处动,则变而为风,可形可感而显阳性,反之亦然。由此可知,船山不再把动静分裂开来看待,而是将动静对立统一起来,用动静的辩证统一规律来解释世间万物的生成变化,并且把动静视为事物所必然具备的存在状态,而不是将之理解为先验的东西,或某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从而站稳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

基于这种对动静的理解,王船山又进一步地认为,正是因为有动静的错综变化,才促使万事万物不断地发展创新,一事物经过动静变化更替,又可生成另一新事物。船山认为:“……或聚或散,或出或入,错综变化,要以动静夫阴阳。而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从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同时,王船山认识到了动静对于人的完善很有意义,如:“静而万理皆备,心天不正,动而本体不失,意无不诚,尽性者也。性尽,则生死屈伸一贞乎道,而不挠太虚之本体,动静语默一贞乎仁,而不丧健顺之良能,不以客形之来去易其心,不以客感之贞淫易其志。”船山强调,当一个人处静时要能做到“心无不正”,不可静而思邪;而要宁静致远。如果处动,则要“不失本体”,要做到意诚不阿。总之,要想德操高致,必须理清动静变化之要数。于此,船山看到了任何事物都在“变化日新”,所以,人类社会也因此日益进步,人性也日益趋于完善。感而知之,船山是乐观的,他期望着人类社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哲学思维阐明了事物内部复杂的矛盾变化,从而初具了唯物辩证的思维特质。正因为此,王船山认识到了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并且朝着进步的、美好的方向发展变化,从而扬弃了历史循环论,将人类发展史理解为一个不断变化、螺旋上升的演进过程。按照这一规律,王船山坚信,人类社会一定能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发展和进步的至高境界,船山谓之“太和”,既“太和”世界,这同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共产主义世界已相差无几。可以说,王船山先于马克思几百年就具有了这种理想,只是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样科学、系统罢了。正是因为船山思想中涵有这种理想,才激起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的出路和振兴苦苦思慕和奋力探求,从而使得中华民族不至于越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轨道,使得华夏文明能牢牢根植于优良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上,从而指导中国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步步走向马克思主义,再走向我们今天拥有的幸福。这一切不能不说有船山先哲的一分功劳!

〔主要参考书目〕:

- 1、《船山遗书 张子正蒙注》傅云龙,吴可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 2、《船山遗书 周易内传》傅云龙,吴可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
- 3、《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舒远招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4、《论王船山的本体哲学》张立文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 年第 5 期
- 5、《和合学概论》张立文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看王船山教育思想

何佳真

“仕”与“学”是儒家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儒家教育价值观的根源。本文试图从历代儒学思想家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语义，“仕”与“学”的辩证关系的解释，及儒学大师王船山在通过批判吸收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这一儒家经典教育思想所做出的新的诠释与规范、来把握王船山的教育思想，并试图为当今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些许借鉴。

（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语义及辩证关系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体现，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它是孔子的门人子张说出，虽然不是孔子亲口说出，但历代的儒学思想家都认为它反映了孔子的教育价值观。因而历代儒学思想家都根据自身的理解，对它进行诠释。然而，对这句话从不同角度的理解和不同程度的诠释，使先秦儒学思想中教育的价值观本来面目没有得以完整的展现，其在教育上所应具有的积极意义没有得到应有体现，甚至于对这句话的曲解、误解，反成了某些苟蝇取利的学者追逐名利的借口。而王船山在批判吸收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为这句话做出正确的解释，并对它的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并试图对当时教育价值观进行规范。那么，从语义上忠实理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历代儒学思想家对它的解释，也成为我们正确把握王船山对它所做出解释和诠释的前提。

1. “优”的本义是“饶”。理解“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这一句话的关键是正确把握“优”的含义。汉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

解字》对“优”的训释是：“优，饶也，从人忧声。”清代汉学家段玉裁进一步做了较为详尽的注释：“食部饶下曰：‘饱也’。引申之余曰饶。诗《瞻卬》传曰：‘优，渥也。’笺云：‘宽也。’《周语》注曰：‘优，饶也。’《鲁语》注曰：‘优，裕也。’其义一也。引申之为优游；为优柔，为俳优；《商颂》：‘布政优优。’《小雅》：‘既优既渥。’今皆本假为之。”^①从他们的注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优”的本意是饶，包含在优裕、富足、丰富、有余力等诸多义项中，所以段玉裁说“优”可以引申之为“有余”。在对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进行注解时，大都将“优”释为有余力。如有的学者说：“云仕而优学者，优，则行有余力也。”朱熹也说：“优有余力也，仕与学理同而事异。故当其事者，必先有尽其事，而后及其余。”^②但王船山却认为“优”释为“有此力也。”^③显然“有此力也”和“有余力也”在语义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在于王船山与其它一些儒家思想家（主要以朱熹为代表）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语义，及“仕”与“学”辩证关系上有着一定的区别。

2.王船山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语义，及“仕”与“学”辩证关系的见解是：“学者学其可以仕之理，仕者行其所以学之道；理相通，则事不相悖，虽然，人之志力，一则专，杂则两废。仕有仕之事，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有不遑朝夕者，必其力之沛然有余，而君民无形隔势禁之患，乃以燕处而求益于《诗》《书》，斯有益于仕而无所废。学必尽学之功，温故而不忘，知新而日益，有不暇外求者焉。必有其业之纯熟无间，而朝廷有旁求敷奏之典，及以委势而宣力于国家，斯不负所学而志以行，行无越思，而道可兼尽，仕者其尚念之哉！”^④王船山认为“学习的人能够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务，从容处理各种事务的方法。做官的人运用学习到的知识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朱熹在《四经集注》中的看法是：“然仕而学，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学而仕，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在语义上，朱熹认为“做官了有余力便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在“学”与“仕”的辩证关系上，朱熹的观点是“资其仕者益深”“验其学者益

广”王船山的观点是“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行无越思，而道可兼尽”我们不难发现，朱熹侧重的是“知”，而王船山侧重的是“行”。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二者在“学”与“仕”，换言之在“知”与“行”这一教育思想内在本质上有不同的见解。

（二）“知”与“行”的认识

从更深刻的角度来说，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教育学中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客观唯心主义者程朱，主张“知先行后”。程颐说：“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⑤这就是说人们获得知识才有行的条件。“知”是“行”的基础。朱熹取程氏之说并加以发展，概括为“知在行先。”他说：“论先后知为先。”^⑥而以主观唯心主义者为代表的王守仁，又把“知”与“行”等同起来。提出“知在先行在后，知行合一”。他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时，已自恶了。”对朱熹的先知后行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王船山都进行了批判。他在《读四书大全》中批判朱熹的知行先后：“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显著于天下，循而得之。”而“循”就是对理的探索，就是行。“循者，依缘而率由之谓也。依物之实，缘物之理，率由其固然，而不平白地画一个葫芦与它安上。”指出实际上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他在《尚书引义》中批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犹有其知也，亦惛然若有所见也。行者非行，而以其所知为行也。”也就是说，王守仁的见好色，闻恶臭虽不是探索物之理之知，但到底有所见，还可算是知；而王守仁所说的行，则根本就不是行，而是把知混同行，是销行以归知，实际上是混淆知与行的区别。

提倡实学的王船山，从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反映论出发，指出，行是知的前提和基础，即“行必统知”。同时，又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即“相互为成”“相资以互用”。知与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现分述于下：

首先，王船山深刻地论证了“行必统知”，王船山在《尚书引义》中较详细论述道：“且夫知也者，因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知，行以为知也必矣。”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六中说道：“凡知者或未能行，而行者则无不知。……知有不统行，而行必统知。”“格致有行者，如人学弈棋相似，但终日打谱，亦不能尽达杀活之机，亦必与人对弈，而后谱中谱外之理皆有以悉喻其故。且方其逆著心先打谱，已早属力行矣。盖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使尔，无论事到身上，由你从容去致知不得。使尽有暇日揣摩得十馀年，及至用时，不相应者多矣。”照他的讲法，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知识，它经常受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局限。因此，只有用“行”或实践的办法，才能使书本知识“活”用起来。就如在学习或研究围棋的道理时，专看棋谱是不够的，要照着谱子去摆阵势，这便是行了。还要时常和他人对弈，这更是行了。这是在行中求知，在实践中认识道理。

其次，王船山深刻地论证了“相互为成”“相资以互用”，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卷三说到“知行之分有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之事，则亦有行矣。应事物之际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终始不相离……而更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又说“知虽可以行为资，而行乃为知之实。”在王船山看来，“知”和“行”是有界限的，有区别的，不能混而为一，各有各的作用。“知”是讲求义理的格物致知的活动，即认识活动；“行”是应物接事，身体力行的活动，相当于实践活动。但两者间是有统一性的，“知”指导“行”，使“行”有预见，“行”也伸入“知”中，既没有完全脱离“行”的单纯的“知”，也不存在一无所知的单纯的“行”。两者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王船山在《礼记